前沿探索

◎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我们要充分认识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开拓进取、扎实工作，切实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好

# 把科技创新摆在核心位置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张晓强

从全球范围看，创新驱动是大势所趋，即将出现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了历史性的交汇，为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新一代信息技术包括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在高速发展，风能和太阳能的利用日益广泛，生物技术、新材料对农业、工业、医疗健康的影响日益显现，高端装备制造不断取得重要进展。在此形势下，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经济体大国都在积极作为。对中国而言，抓住了这样的机会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从国内看，创新驱动是形势所迫，我们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但发展中的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突出，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2012年我国消费了世界50%的钢、水泥、煤炭，石油进口依存度达57%，铜进口依存度达到70%，而大量消费能源资源所造成的大气、水、土地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近年以来多次出现的严重雾霾天气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和创新的作用，才能够保证我们有效地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 ☞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大势所趋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从某种意义上讲，最迫切的不是增大科技投入，也不能就科技创新谈科技创新，而是要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步伐，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单从科技数量来看，新世纪以来我国科技研发投入快速增加，2012年超过1万亿元，占GDP的1.98%，但科技资源配置不合理，利用效率低，大量的科研成果不能转化为应用技术的问题十分突出。

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因此必须将深化改革作为有效实施创新发展战略的抓手，对现有的科技管理体制及相关的财税、人才、投资等多领域进行系统配套的改革，将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紧密结合方能事半功倍。为此，要重点把握以下4点：

第一，着力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此一定要把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作为关键，让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让市场真正成为配置创新资源的决定性力量。目前，我国大中型企业科技研发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仅为1%，与发达国家大企业5%的水平有很大差距。为此要加快构建由企业牵头，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支撑，各类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技术创新体系，即使是一些基础性、公益性的科研专项也要注意发挥骨干企业的作用。要围绕激励企业创新来完善金融、税收、价格、财政、知识产权等管理政策，增强企业创新的内生动力，打通经济与科技间的通道。例如我国财政科技支出中给企业的仅占15%，而发达国家达30%以上，要积极研究提高财政科技支出用于企业的比例的相关措施。

## ☞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

第二，政府在关系国计民生和产业命脉的领域要积极作为。加强支持与协调，包括总体确定技术方向和路线，用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科技重大工程等抓手，集中力量掌握更多的关键核心技术，抢占制高点。要改革国家对科技资源的管理体制机制，解决好多单位分蛋糕、抢课题等重复浪费的顽症，解决好科研单位与高校存在的大批高端科研装备不开放、不共享、低利用率的突出问题。要改革国家科技经费使用的绩效评价体系，弱化发表学术论文数量、出了几位两院院士、获了多少科技成果奖等指标，而突出发明专利授权、技术成果转化率、促进产业技术进步等方面的考核。2013年中组部发布《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更加重视科技创新的考核，这体现了党政机关都在积极推动创新驱动。

第三，根据经济、社会、国家安全的重大需求，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及相关支持体系。目前，我国正处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化解过剩产能的攻坚阶段。要通过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展现代农业，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这既是优胜劣汰、破旧立新，又能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作用。通过发展节能环保、信息消费、新材料、物流等产业也可以为化解产能过剩中突出的就业、税收减少等因素提供广阔的增量空间，并提高我国产业的总体素质。

第四，深入把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丰富内涵。在加快科技创新的同时，加强产品创新、品牌创新、产业组织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近几年，美国苹果公司推出的iphone、ipad大获成功，既是基于技术创新，也是产品创新、品牌创新和用户体验创新的协同效应。马云创办的淘宝、天猫电子商务平台，近几年快速增长，2012年交易额超过1万亿元，据说2013年能达到18000亿元，增长50%以上，其核心我认为是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有机结合。

第一，结合深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在最大限度取消和下放投资项目审批核准权限的同时，及时建立完善配套的重要产业准入和监管机制，并充分考虑体现创新驱动发展。例如要使产业技术经济政策发挥更大的作用，对钢铁、水泥、石化、船舶、光伏装备等产业，要制定实施更高的准入技术标准和相关联的体现技术进步的环境保护、能源利用效率、资源利用效率、产品质量、土地集约利用等标准，既防止一放就乱，又在简政放权中更好地发挥技术创新的作用。

第二，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型。我国东部地区发展水平高，基础设施完善，消费能力强，科技资源丰富，但是要素成本不断上升，环境污染问题极为突出，资源约束瓶颈和转型升级压力较大。要将东部作为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点推进区，对京津冀、上海、江苏、浙江、广东、辽宁等省市积极推进国有单位科研成果所有权和知识产权制度改革，完善科技创业投资和金融支持的政策，加大国际创新的合作力度。在推进中关村、张江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发展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完善政策，并有序扩大政策适用范围，要推动高技术产业园区和高技术产业基地的集聚发展，实现创新发展的二次创业。

## ☞ 近期正在考虑的五项重点措施

第三，研究制定重要产业的创新发展路线图和实施方案。对能源、汽车、冶金、石化、集成电路等行业或重要产品，要明确提出创新发展的主要目标、技术路线、保障措施和推进时间表，使之与产业发展规划、重大生产力布局规划有机结合，协调推进。

第四，实施新兴产业引导工程。对信息消费及信息惠民、节能环保、宽带中国、移动互联网、新能源、智慧城市、电子商务以及智能物流等统筹推进重大产业引导工程，以企业为主体，政府引导支持，加快相关产业的技术创新步伐。

第五，实施创新企业百强工程。发挥好重点行业、领军企业在创新驱动发展方面的引领带动作用，要积极提升骨干企业技术研发机构的能力，要推动建设更多的以龙头企业为主体的产业技术联盟，要支持企业建立与完善全球化的研发网络，更有效地开展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技术先进的创新型旗舰企业。

理论在线

# 积极培育民间投资主体

王逸菲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间投资具备相应实力，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如何把民间资本引上科学发展的轨道，让它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服务，需为民间投资创造良好环境，大力培育民间投资主体

## （一）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一论述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指明了方向。可以预见，随着各项具体改革措施的逐步到位，我国将进一步扩大企业及个人投资，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民间投资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会不断凸显。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打破了高度集中的国家单一投资体制，形成了包括中央、地方、企业和个人的多元化投资结构，对促进投资效益的提高、推动投资市场逐步形成发挥了重大作用。近年来，随着民营经济快速发展，民间投资增速大幅提升，但并不表明民间投资及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间投资具备相应实力，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如何把民间资本引上科学发展的轨道，让民间资本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服务，为全社会造福，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 （二）

值得注意的是，培育民间投资主体，确立民间投资主体在投资市场中的地位，关键是看民间投资能否具有合理的投资行为。合理的投资行为包括：较强的自我积累倾向，特别是边际积累倾向；能够从效益成本曲线和风险收益对比的角度调节投资规模；能够采取优化的规模结构、时间结构，关心长期和远程投资。而目前影响民间投资行为合理性的因素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企业自身的局限，难以从长远利益以及投资均衡的角度确定投资方向和投资规模。二是民间投资主体外部环境亟待改善。这些因素包括现行金融体制、融资成本压制了民间投资行为，市场准入政策抑制了民间投资欲望，繁杂的负担挫伤了民间投资积极性，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影响民间投资效率，等等。

基于上述限制因素的考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我国新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间资本能否真正成为支撑经济发展的强翼，实现民间投资对经济的强力带动。为此，需要为民间投资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体制环境、融资环境以及社会服务环境，清除启动民间投资存在的障碍，大力培育民间投资主体。

首先，要清除准入障碍，拓宽民间投资领域，为民间投资创建良好的法制环境。要进一步明确鼓励、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的行业和领域，在企业投资项目方面，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外，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政府不再审批；进一步明确和畅通民间投资进入重点行业领域途径和渠道，创新投资方式，为民间投资进入提供多种选择。要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要求出发，补充、修改和细化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大力清理各类投资法规和政府规章中不利于启动民间投资的有关规定，改革政府审批制度，清除制约社会民间投资的各种限制和歧视性政策，要制定清晰透明、公平公正、操作性强的市场准入规则，破除“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支持民间投资按照国家规范化要求，以多种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高新技术产业、新兴服务业等具有发展潜力的领域。

其次，要改革投资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为民间投资营造良好的体制环境。通过加快民间投资管理体制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简化审批手续，减少审批环节，提高审批效率。进一步调整税收政策，认真清理和规范涉及民间投资的各种税费。调整有关政策，逐步建立起程序化、科学化、规范化的管理模式。通过建立公共产品的合理价格、税收机制，引导民间投资的活动。

第三，要发展多层次的现代金融体系，拓宽民间投资的融资渠道。必须打破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高度垄断的局面，规范发展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在合理布局和适度竞争原则下，有步骤地开放民间资本参与城市信用社和城市商业银行的重组改造，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同时制定并完善鼓励民间投资的信贷政策，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要积极创造条件，建立产业投资基金和风险基金，支持具备条件的民营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债券、股票上市融资。

与此同时，还要健全社会服务体系，加强对民间投资政策信息引导和服务。这要求我们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鼓励发展商会、行业协会、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投资咨询中心、技术支援中心等中介机构，为民间投资者提供有关股份制改造、法律保护、社会保障、科技专利申请、无形资产评估、科技信息沟通、专业技术职务评审等方面的政策信息，并给予政策、法律、技术、财会和市场信息等方面的咨询服务；建立健全投融资政策信息发布制度，设立投资信息服务平台，定期向社会发布政策信息、投资信息、市场供求状况信息等，通过及时、准确、灵敏的信息，大力引导社会民间资金投资到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行业上来；加强产品和技术创新推广，引导民间投资者发现合适的投资方向和项目。（作者单位：中国铁建投资公司）

学术经纬

# 加快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 陈启清

近来，资本项目可兑换引发的争论颇多。对我国而言，加快资本项目可兑换实际上是顺应市场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需求，破解人民币国际化制度障碍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资本项目可兑换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也引发了激烈争论，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资本项目可兑换进行了明确规划，提出“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关于资本项目可兑换，需要明确：第一，国际社会对资本项目可兑换并没有严格一致的界定和标准。在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概念上，没有形成一个严格一致的定义。同时，一个国家的资本项目开放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被称为实现了资本项目可兑换，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评判标准。第二，由于标准的缺乏，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对各国资本项目可兑换没有明确的要求，中国在此也没有受到像人民币汇率一样的外部压力。第三，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后一国也将增加更多的风险因素。

既然技术上国际社会对我国并没有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要求，同时资本项目可兑换还有着巨大风险，那为什么我们还要主动推动这样一项改革，尤其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还要“加快实现”呢？这就需要从战略层面来理解。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现代国家竞争的制高点。当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当中国制造席卷全球之后，中国金融能否接续崛起就成为事关中国经济在全球影响力的重大变量。各国发展表明，货币国际化是实现金融崛起的有效手段，因此，人民币国际化成为中国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基础上实现大国发展的自然之选。同时，人民币国际化也是解决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的战略之选。改革开放后，中国主动融入全球美元体系，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当中国成为美元体系之下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在美元体系下的国家风险日益增强，我们面临严重的内外失衡、巨大的汇率风险、庞大的外汇储备压力、日趋严重的泡沫经济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在内部与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有关，在外部与中国身处美元体系有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从制度上脱离美元体系，重建人民币体系。新世纪以来，我国顺应国际社会需求及时启动了人民币国际化，短短几年，发展迅速，已成为全球重要的贸易融资货币之一，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恰恰面临巨大的制度障碍——资本项目管制。加快资本项目可兑换实际上是顺应市场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需求，破解人民币国际化制度障碍的必然选择。

当前条件下加快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需要注意什么？这里有3个关键问题。

其一，顺序很关键。加快并不等于不顾条件，不顾顺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有序”要坚持一个原则，就是需求导向。市场有这个需求，就相应放开，不要超越阶段、超越实体经济发展的需求去激进开放。

其二，时机很关键。正确的战略在错误的时候执行可能造成负面效应。当前立即推行资本项目可兑换可能会面临一些风险。一方面，因为国内外资产价格差距比较明显，发达国家的资产价格尤其房价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普遍下跌，处于低位，而我国房价这些年连续上涨，身处高位，一旦资本项目开放，很可能出现国内资金抛售国内高价房产去配置国外低价房产的情况，这将给目前的经济金融系统带来重大影响。另一方面，美联储已经启动QE退出，美元因美国经济复苏、欧洲日本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持续、新兴市场经济风险增大等因素升值，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这些因素都意味着全球货币可能回流美国。实际上，“加快实现”并不意味着马上要放开资本项目，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资本项目都要加快，具体的时机把握可以考虑由管理层来自主决定。

其三，预留管理手段很关键。国际经验已经充分表明，资本项目可兑换风险巨大，很多国家正是因为不恰当的资本项目可兑换而酿成金融危机，但各国的实践也表明，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风险并非不可控制不可管理。这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在这样一个基础和条件下来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这一管理的重点放在两个方面：外债和资本流动。首先要加强外债管理，合理调控外债规模，优化外债结构，防范外债资产负债不匹配、期限不匹配等风险。其次要完善资本流动管理，建立资本流动监测体系，做到应统尽统；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监管，限制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的金融衍生品的跨境交易。外债和资本流动的管理都要放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之下来设计，要统一纳入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注重跨部门的监管协调。同时还要预留管理手段，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对资本流动采取临时性管理措施。

本版编辑 欧阳优